

中东变局考验欧洲

■王大宁

美以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将欧洲置于多重压力之下。这场中东变局，不仅使跨大西洋关系裂痕进一步加深，也再度凸显欧洲内部的立场分化与战略困境，成为检验欧洲凝聚力与自主性的又一块“试金石”。

美国再度“背刺”欧洲

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全程将欧洲排除在决策与行动之外，被普遍视为美国对欧洲盟友的又一次公然“背刺”。

美国在此次行动中明显弱化了欧洲盟友的地位。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在重大军事行动中完全撇开欧洲——事前不通报、事中不协商、事后不解释。此前美国发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战争时，总爱拉上欧洲以彰显“西方团结”，如今却将欧洲视为拖累，认为其只会添乱、无法提供实质性支持。美国在不久前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对欧洲的安抚，如今更显得苍白无力，欧美互信的根基再次遭到侵蚀。

美国的行动也使欧洲战略环境急剧恶化。欧洲已深陷俄乌冲突四年有余，无力承受东、南两线现实威胁同时升级乃至共振。美国在中东点燃战火，直接将欧洲推向多重风险：中东是欧洲重要的能源来源地，战火爆发仅10天，欧洲天然气与石油价格分别上涨50%和27%，额外增加高达30亿欧元（约合34.5亿美元）的能源支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进一步推高欧洲通胀压力，冲击民生与政局稳定。中东变局还可能引发新一轮难民潮和恐怖袭击，激化欧洲内部矛盾，影响社会秩序。

此外，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单边动武，严重破坏了欧洲赖以发展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面对美国的自私与背弃，越来越多欧洲人认清：真正的威胁并非伊朗，而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本身。这场中东变局，预示着西方阵营内部的分歧与博弈将长期激化。

欧洲并未跟进动武

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使欧洲面临在中东地缘格局重塑中被边缘化的风险。为避免沦为“旁观者”，欧洲采取了一系列应变举措。

面对变局，作为昔日伊核协议的重要推动者，欧洲优先选择外交手段。冲突爆发后，欧洲在观望之余试图争取话语权。欧盟声明虽未直接批评美以，却与美以“政权更迭”目标保持距离，呼吁各方克制，以保护其侨民及能源、贸易利益。英法德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可采取必要且相称的防御行动，计划联合海湾国家，以“安全提供者”身份发挥作用，既保留军事介入可能，又强调行动的防御性与适度性，力求避免直接卷入冲突。但欧洲外交节奏滞后，未能跟上局势升级速度，斡旋效果有限。



上图：3月5日，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驶往地中海。



左图：3月10日，美国“龙”号驱逐舰启程前往塞浦路斯。

外交斡旋无果后，欧洲选择有限军事介入，并未跟进美国动武。随着战火持续外溢，英法德等国提升战备水平，向地中海、红海及海湾周边派遣军事力量。不过，欧洲始终坚持“规模有限、止于防御、回应适度”的军力运用原则，严格与美以行动划清界限，并婉拒特朗普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倡议。

欧洲对美国动武几乎集体“作壁上观”，背后有深刻且现实的考量：欧洲已深陷俄乌冲突，防务压力巨大，无力承担两线作战；美国此前在中东发动战争的后果已反复证明，中东动荡可随时甩下“烂摊子”一走了之的美国影响有限，却极易殃及邻邦的欧洲，不仅伤及欧洲在中东的经贸、人员和基地等现实利益，还会长期冲击欧洲的能源供应、经济稳定与社会安全。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一年多以来的“美国优先”行径，已使跨大西洋同盟信任大幅下降，更促使欧洲反思充当美国伙伴乃至附庸的反噬效应。欧洲在此次中东变局中的选择，折射出国际格局与美欧关系的深刻变化。

处境各异立场有别

面对中东变局，欧洲内部立场逐渐分化，各国基于自身利益作出不同选择，整体呈现“两极鲜明、大国微妙、多数沉默”的格局。

立陶宛和西班牙分别站在支持和反对美国的两端。立陶宛是欧洲唯一公开明确支持美以行动的国家，宣称军事打击不可避免，并表示可出兵协助。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与之立场相近，其重

要动机是对冲地缘安全焦虑：受俄乌冲突影响，它们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企图以全力支持美国行动换取可靠安全承诺。

西班牙公开反对美以军事行动，该国首相桑切斯谴责美以行动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军使用境内军事基地。西班牙敢于“硬刚”美国，有多重底气支撑：左翼联合政府长期坚持多边主义与国际法原则，此举顺应国内反战民意，有助于巩固执政地位；地缘上，西班牙是美国在南欧一地中海和北大西洋两大战略方向不可或缺的战略支点，远离俄乌冲突前线，对美安全与经济依赖度较低，且获得欧盟内部外交声援。

英法德3国的立场则相对复杂。英国一直是美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最可靠的盟友，深陷“英美特殊关系”这一困境，因而受冲击较大、立场选择困难。政策转换过程也显得自相矛盾。英国最初以伊拉克战争为鉴，拒绝为美提供军事基地，很快又在美方压力下，同意有限使用其基地，试图在政治疏离与行动配合间保持平衡。

法国超脱中显进取。在中东拥有军事基地和武器销售市场，对中东油气能源依赖度较低，有利于法国在中东拓展自身影响力。作为带头追求战略自主的欧盟大国，法国公开批评美以行动未经联合国授权、违反国际法；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朗总统通电话，争取外交话语权；派遣“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赴东地中海，舰队综合实力、舰艇数量及出动速度均远超英国，且接纳意大

利、西班牙、荷兰和希腊等国舰艇加入，“组团”联合行动，以彰显其欧洲防务代言人身份。

德国暧昧中显无力。德国受二战“历史包袱”与美国在欧最多驻军的双重束缚，政策转圜空间较小，虽不认同美以的单边军事行动，却不敢公开表态批评。

大部分欧洲国家及欧盟机构采取模棱两可或沉默立场。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其声明中呼吁相关方克制、保护平民和尊重国际法，却回避对美以行动的评判。这反映出欧盟在中东变局议题上缺乏协调、立场不一，既不愿违背自身在国际法和价值观方面坚持的原则，也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多数欧洲中小国家则顾虑较多、不愿发声。

战略自主任重道远

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引发的中东变局，在给欧洲带来多重冲击的同时，也暴露出欧盟推进“战略自主”面临的深层困境：由于对美国存在较深安全依赖，缺乏对抗美国的实力，只能在默许、迁就与有限抗议之间徘徊，难以真正对美说“不”。欧盟内部利益诉求、安全处境差异较大，面对重大危机事态立场各不相同，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用一个声音对外发声。

面对中东战事延宕的风险，欧洲只能采取矛盾而务实的两手策略：在军事上，保持有限防御与威慑姿态，既避免直接卷入战火，又保留适度介入空间，防止无法介入；在外交上，借助海湾国家及其他域外大国力量，劝和促谈，推动冲突降级，力争将美以拉回谈判轨道。

欧洲并非没有清醒的声音：西班牙首相公开明确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军事干预，道出了诸多欧洲国家不便明说的真实立场。欧洲若想真正走出“危机—应对—再危机”的怪圈，就不能继续将自身安危系于他人。只有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与国际法，主动承担周边安全责任，与国际社会和乎力量站在一起，欧洲才有可能摆脱被动应对的困境，成为多极化世界中独立、可信的一极。

西方技术，适配北约体系，且价格较低、政治附加条件少。波兰、挪威等国持续批量采购制坦克、火炮与战机，凸显韩国军工在欧洲市场的快速崛起。

欧洲武器出口国排名的攀升，除受欧洲国防工业产能复苏和对乌军事援助增加等因素影响外，还源于俄罗斯份额萎缩与全球替代需求上升。俄乌冲突爆发后，俄武器生产优先满足本国作战需要，加上西方制裁施压，使俄武器出口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地区紧张局势促使多个中东国家在加强与美国军贸关系的同时，也寻求新的供应来源，为欧洲武器出口腾出空间。

欧洲主要武器出口国呈现开拓海外市场与扩大对欧供应并举的态势。法国以9.8%的份额稳居全球第二出口国位置，出口较上一个5年增长21%，近80%销往欧洲以外地区。印度、埃及和希腊是其排名靠前的客户。德国以约5.7%的全球市场份额位列全球第四，24%的武器出口流向乌克兰，欧洲市场对其防空与装甲装备需求旺盛。意大利武器出口增幅达157%，成为全球第六大武器出口国，其中出口武器的59%销往中东地区。

从全球格局看，欧洲武器贸易激增，标志着世界安全秩序与军贸重心的深刻调整：美国借俄欧冲突强化对欧控制，以“安全焦虑”换取军火利益；欧洲在防务依赖与自主追求之间摇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装备依赖；俄罗斯武器出口份额下降，引发法、德、韩等国抢占市场，全球军火版图正加速重构。

3月12日，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发表全国讲话，明确表示不会签署实施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相关法案。这份能为波兰带来大额防务支持的法律已在议会获得通过，却在总统签署的最后环节被搁置。消息一出，立即震动欧盟，也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

随着“欧洲再武装”进程启动，2025年5月，欧盟理事会正式批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该计划以利率优惠的长期贷款形式，为有武器装备采购需求的欧盟成员国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为提升欧洲武器装备生产的自主性，计划明确规定，接受贷款的成员国用于采购欧洲以外地区生产的武器及其零部件的款项，不能超过贷款总额的35%。

欧盟意图通过该计划的贷款“杠杆”，扭转各成员国在军购上长期各自为政，导致军备建设重复和“碎片化”的局面，从而整合各国防务能力，增强共同防务机制在欧洲防务领域的主导权，最终实现“欧洲人自行守护欧洲的安全”。2025年9月，欧盟委员会公布贷款初步分配方案，共有19个成员国表达参与意向，申请总额甚至超出计划规模。其中，波兰获得的额度最高，总计约437亿欧元。

纳夫罗茨基长期主张强化国家主权、反对欧盟过度干涉内政，倡导波兰基于本国利益参与欧洲防务。他在讲话中阐述了拒签“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理由，认为该计划看似“雪中送炭”，实则是“特洛伊木马”，将损害波兰的防务和财政自主权，甚至“套牢”波兰几代人。他指出，这笔贷款本质上是期限长达45年的巨额外债，波兰最终需偿还的金额接近本金的两倍，真正从中获利的将是西方金融机构，而非波兰本国。此外，在该机制下，欧盟可能通过所谓“条件性原则”暂停资金拨付，而波兰仍须继续履行偿债义务。

纳夫罗茨基的拒签决定在波兰国内引发激烈争论。波兰总理图斯克对总统的决定表示谴责，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梅什更是直言此举“错误且危险”，认为放弃欧盟资金支持将拖慢军队现代化和转型进程。总统的支持者则反驳称，波兰扩充军备旨在提升国防实力、捍卫国家主权，而非成为欧盟的“附庸”。

实际上，波兰总统的担忧在欧盟内部并非孤例。对于接受欧盟长期贷款可能带来的沉重财政负担，法国、意大利等国政要此前已表达过类似担忧。与此同时，美国也批评该计划“意图排挤美制武器装备的采购”。在此

「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在波兰受阻

■王成文

共同防务难过「主权至上」关

背景下，长期在防务上高度依赖美国及北约的东欧国家，可能效仿波兰总统的抵制立场。这些都增加了“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不确定性。

“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受挫，显然会对欧洲“防务自主”乃至“战略自主”进程产生负面影响。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波兰总统的拒签之举也为欧盟敲响警钟：随着欧洲防务一体化的推进，欧盟与各成员国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欧盟若试图以贷款为筹码过度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难免引发抵触，反而不利于欧洲防务一体化的长远发展。



从恪守中立到“呼朋引伴”

瑞士加强与欧盟防务合作

■观山海

3月5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与瑞士外交部长卡西斯签署《关于加强外交与安全政策合作的联合声明》，并举行该声明框架下首次政治对话。根据声明，双方建立年度高层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扩大涉及地区热点及“混合威胁”的情报共享范围，瑞士还可受邀参与欧盟外长会议。同时，双方签署的《框架参与协议》为瑞士参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机制下的相关行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对外派兵仍需获得瑞士议会批准。

瑞士虽非欧盟成员国，也未加入“欧洲经济区”，但与欧盟经济合作密切、社会往来深入，曾临时参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机制下的多次行动，如欧盟驻波黑维和部队、欧盟萨赫勒马里能力建设特派团及欧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等，这为双方深化防务合作奠定基础。

近年来，受俄乌冲突带来的安全压力影响，瑞士正有限增加国防投入，逐渐调整其传统中立立场，开始寻求对外防务合作，其中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合作最为广泛。瑞士已相继加入德国发起的“欧洲天空之盾倡议”、爱沙尼亚牵头的“网络靶场联盟”项目，欧盟“永久结构性合作”防务机制下的研发项目，以及“军事机动”项目等。装备采购方面，瑞士正与德国代做防务集团订购IRIS-T中程防空系统，从通用动力欧洲公司接收120毫米迫击炮系统；近3年已参加20余次由欧盟国家牵头或在欧洲地区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瑞士政府一再强调有选择地参与欧盟防务合作项目，其能否在后续防务合作中坚持有限参与、自我决定原则，平衡自身政策传统与外部合作需求，仍有待观察。

特朗普重返白宫成为推动瑞士与欧盟合作的另一诱因。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也波及瑞士，经多轮磋商与谈判，才将加征关税比例从39%降至15%。瑞士于2022年向美国订购36架F-35A战斗机，原计划自2027年起陆续接收，以替换现役F/A-18和F-5战斗机。随着民众对美信任度下降，该采购案遭到广泛质疑与抵制。社会各界呼吁向更为可靠的欧洲伙伴采购武器装备，法国达索公司的“阵风”战斗机、欧洲多国联合研发的“台风”战斗机和瑞典萨博公司的“鹰狮”战斗机，均被瑞士列为竞标候选对象。瑞士军方认为，采用欧洲统一标准的武器装备，有利于降低使用和维护成本，并提升与欧洲国家军队在联合行动中的互操作性。

面对国际局势变化，瑞士正因势利导推进国家“再定位”。欧盟则乐于将瑞士纳入其整体防务框架，以完善防卫布局“拼图”。不过，瑞士国内对于加强与欧盟防务合作是否会限制本国政治与外交独立性乃至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更频繁的人员往来是否会引发公共安全和秩序问题，仍有较大争论。俄乌冲突的走向，也将直接影响双方防务合作的深度。

瑞士政府一再强调有选择地参与欧盟防务合作项目，其能否在后续防务合作中坚持有限参与、自我决定原则，平衡自身政策传统与外部合作需求，仍有待观察。

上图：瑞士国防军进行军事演习。

欧洲再成国际军火贸易焦点

■李海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2021至2025年，欧洲成为全球最大武器接收地区，武器进口量较上一个5年增长210%，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的33%，直接推动全球武器贸易增长9.2%。与此同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跻身世界武器出口国前列。欧洲武器进出口同步走高，是安全格局剧变、地缘博弈加剧、军工供需失衡与国

际秩序重塑的结果。

欧洲武器进口爆发式增长，最直接的动因是俄乌冲突持续与安全焦虑升级。对乌克兰的大规模武器援助，成为最显著的拉动因素。同时，欧洲多国普遍感受到安全威胁，纷纷扩充军备、补齐援乌消耗的库存。北约29个欧洲成员国武器进口增长143%，波兰、英国紧随乌克兰之后，成为主要武器进口国。

美国成为欧洲扩军浪潮的最大受益者。2021至2025年，美国出口武器的38%流向欧洲，欧洲进口武器的48%来自美国，而在北约欧洲成员国进口的武器中，这一比例高达58%，以先进战机和远程防空系统为主要进口装备。

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欧洲对美国安全保障的稳定性存疑，进一步推高军购需求。欧洲本土军工产能不足且在高端领域存在短板，是其不得不持续大量外购武器的关键原因。长期和平红利导致欧洲军工产能收缩，冲突爆发后扩产缓慢，交付滞后。例如，IRIS-T防空系统年产仅4套，“台风”战斗机年产不足15架，远不及美国F-35战斗机百架以上的年产量。在隐形战机、远程反导、大型无人机等关键领域，欧洲存在技术空白，仍倚赖美国。

韩国凭借独特优势，成为欧洲军购市场的“黑马”。2021至2025年，韩国跻身北约欧洲成员国第二大武器来源国，占比8.6%。韩国武器生产线全天候运转，能快速交付重型装备，精准匹配欧洲“紧急补缺口”的需求。其装备采用



德国“豹”-2坦克。